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

潘崇◎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水陸交困國中有識之士聚衆請求今亦立布

來之震撼輕故其動本國之感情緩然而強大如俄猶激動於東方戰敗計無

出於立憲以冀挽回國勢觀於今日國無強弱無大小先設一接全出憲法

居可知矣且夫立憲政體利於君利於民而獨不便於庶官者也考各國憲法

嚴無對君統萬世不易君權神聖不可侵犯諸條而凡安樂尊榮之典君得

疑難之事君不必獨肩其責民間之利則租稅得平均也訟獄得控訴也下

命才能得展也也方及事得參預而文也之數者皆公非之利權而受治於

疲冗敗常溺者上得而罷斥之下得而改選之東西諸

習爲常事而指視所集從未及於國君此憲法利君利民不

以致君澤民視爲義務未聞有以一己之私阻撓至計者我

邦環伺逼處岌岌然不可終日言外交則民氣不可爲後援

練兵則少敵愾同仇之志言理財則有剝肉補瘡之虞

復俄國之憲政已成法國之鐵道已通英國之藏情已

充莽然交集有觸即發安危機關豈待著書臣



今之國所以立憲

來之震撼輕故其動本國之感情緩然而強大如俄猶激動於東方戰敗計無

出於立憲以冀挽回國勢觀於今日國無強弱無大小先設一接全出憲法

居可知矣且夫立憲政體利於君利於民而獨不便於庶官者也考各國憲法

嚴無對君統萬世不易君權神聖不可侵犯諸條而凡安樂尊榮之典君得

疑難之事君不必獨肩其責民間之利則租稅得平均也訟獄得控訴也下

命才能得展也也方及事得參預而文也之數者皆公非之利權而受治於

疲冗敗常溺者上得而罷斥之下得而改選之東西諸

習爲常事而指視所集從未及於國君此憲法利君利民不

以致君澤民視爲義務未聞有以一己之私阻撓至計者我

邦環伺逼處岌岌然不可終日言外交則民氣不可爲後援

練兵則少敵愾同仇之志言理財則有剝肉補瘡之虞

復俄國之憲政已成法國之鐵道已通英國之藏情已

充莽然交集有觸即發安危機關豈待著書臣

之國爲已治

出使各國大臣奏請宣布立憲摺

竊臣等伏讀 諭旨特派親貴大臣分赴東西各國考求政治本年巳八月二十
上諭前有旨派載澤等分赴各國考察政治該大臣等各至一國著各該駐使大
采悉心考證以資詳密欽此伏維我

皇太后

皇上勵精圖治奮發爲

清

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

壤地褊小介居兩大洲次之日本

潘崇◎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東亞內訌國脈如縷則

斯跨歐亞之地處負嵎之勢兵力素稱得以安常習故不與風會爲轉移乃近以
水陸交困國中有識之士聚衆請求今亦立布憲法矣最强之國所以立憲最後有其
來之震撼輕故其動本國之感情緩然而強大如俄猶激動於東方戰敗計無復之不
出於立憲以冀挽回國勢觀於今日國無強弱無大小先後一揆全出憲法一途天下
居可知矣且夫立憲政體利於君利於民而獨不便於庶官者也考各國憲法皆
嚴無對君統萬世不易君權神聖不可侵犯諸條而凡安樂尊榮之典君得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 / 潘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61 - 4293 - 6

I. ①清… II. ①潘… III. ①外交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65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448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潘崇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即将正式出版了。这是一部专门探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与近代中国宪政进程的专著。邀我作序，作为他的导师我不应推辞。潘崇 2007 年由河北大学考入南开大学，是我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2010 年博士毕业后，他继续就匿名评审以及答辩组专家的建议，同时又广泛搜罗资料、梳理思路，又以三年之功潜心研究，终于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成现在的这部书稿。

潘崇的这一研究课题属于近代政治史，更确切说属于近代宪政史的范畴。1905—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历时七个多月，途经十余国数十座城市，是有清一代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考察国别最广的官方考察。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政府谋求宪政改革的首个步骤，展示出清朝统治层内部的立宪动力，尽管考察团提供的宪政建言以保留君权、稳固统治为目标追求，截取宪政中有利于己的部分，疏于引入西方法律意识和价值观念，但不少今天仍在探求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等话题都能在他们的言论中找到踪影，考政大臣与学者类立宪派（如梁启超）、士绅类立宪派（如张謇）等群体，共同构成中国早期立宪主义的多个源头，成为清末宪政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国宪政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五大臣出洋考察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需要予以多角度的审视。以往关于清末十年史的研究习惯于将视野聚焦于革命派、立宪派，相对忽略了清政府谋求改革的各种努力。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即是晚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既往研究多从革命史观解读它，观点多有偏颇。本书不落窠臼、另辟蹊径，从清政府内部的改革动力着眼，全面探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相关史实，揭示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宪政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同时以五大臣出洋作为展示晚清社会转型的切入点，揭示历史事件及其社会具体空间的互动

关系。因此，本书在诸多方面有所建树，令人耳目一新。如对考察团出洋考察始末引发的国内外舆论回应的探讨；对考察团随从人员状况的细致梳理；与动态描述考察团始末相呼应，注重探讨清政府内部的改革动力，系统梳理考察团的改革思想及其来源；重视从中外关系视角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团进行分析；关于对考察政治成果尤其是梁启超为戴、端考察团代拟考察成果这一历史悬案的探讨，等等，都深化了我们在此次出洋考察团乃至晚清政局的认识。

在史料运用上，书稿以档案、考察团编订的著述以及报刊等第一手资料为主。档案资料已刊行的如《光绪朝朱批奏折》、《清代官员履历档全编》等，尤其是系统利用了台北“中研院”收藏的“考政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档案，该档案此前学界尚未系统利用过。另外，作者深入挖掘了考察团编订的著述，如戴鸿慈、端方考察团编订的《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列国政要续编》、《考察各国政治条陈折稿》，载泽考察团编订的《日本议会诂法》、《日本政治要览》、《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官制通览》、《日本丙午议会》等，对上述史料的系统利用在学界尚属首次。对晚清报刊史料的广泛利用亦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除了我们常用的《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之外，潘崇曾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家图书馆缩微阅览室查阅了《南方报》、《新闻报》、《时报》等我们并不常用的报刊。

在理论创新和研究视角上，书稿也做出有益的尝试。晚清政体改革带有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共性，更映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底蕴，也暴露出清政府权威合法性大量流失、缺乏驾驭改革的能力等诸多弱点。本书探讨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对西方宪政的移植与变异，并分析了原因所在，从而在理论层面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困境及其诱因的认识。在史实建构的基础上，书稿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和立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末朝野政治互动的复杂格局，为我们理解清政府主导的宪政改革、清末政治生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视角。同时，探讨清政府在宪政改革过程中的权威性流失、中外强烈反差引发的危机感及如何处理集权与分权的矛盾问题，可为我们处理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产生的类似问题提供历史启示。

总之，全书内容丰富，史料扎实，行文流畅，注释规范，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对五大臣出洋考察与中国近代宪政进程的研究，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是一部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专著。但与此课题所涵括的丰富意义比，仍需要从

多学科视角予以立体审视。如从近代以来中国宪政思想及实践发展演化的长时段视角着眼，结合社会改革相关理论，论定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在百年宪政史上的地位；从法理角度着眼，对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归国后的各类政治建言及编译书籍做更深层次的分析。

潘崇对学术一直抱有强烈的热忱，敏而好学，用力颇勤，在清末宪政及晚清留学等问题研究上已多有建树，发表了多篇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2012年7月，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期待着他能在今后的学术求索中有更大的成绩。

元 青

2014年2月写于南开园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3)
第三节 研究思路	(14)
第四节 资料概述	(17)
 第一章 20 世纪初期宪政思潮的勃兴	(19)
第一节 立宪派及革命派的发展	(19)
第二节 宪政论说发展概述	(21)
第三节 时人关于宪政改革步骤的论说	(23)
 第二章 清政府派遣考察团出洋考察决策的确立	(27)
第一节 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27)
第二节 派遣考察团出洋考察上谕之颁布	(46)
第三节 清政府遣使举措引发的国内外舆论反应	(56)
 第三章 考察团出行前的筹备	(70)
第一节 选拔随从人员	(70)
第二节 筹措考察经费	(76)
第三节 确定考察国别	(82)

第四章 吴樾谋刺五大臣及其影响	(89)
第一节 吴樾谋刺五大臣始末	(89)
第二节 炸弹案引发的国内外舆论	(93)
第三节 清政府对炸弹案的调查	(101)
第四节 炸弹案之影响	(107)
第五章 五大臣出洋考察实录	(140)
第一节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考察团	(142)
第二节 端方、戴鸿慈考察团	(167)
第六章 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间国内政局演化	(205)
第一节 政府内部立宪氛围趋于浓厚	(205)
第二节 立宪派的反应	(210)
第三节 革命派的回应	(219)
第七章 考察团归国后的建言及各种编译书籍缕析	(224)
第一节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考察团	(224)
第二节 端方、戴鸿慈考察团	(253)
第三节 两路考察团考察成果之对比	(329)
第八章 五大臣出洋考察之评析	(334)
第一节 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影响	(334)
第二节 五大臣出洋考察之缺失	(367)
附录 五大臣出洋考察团行程表	(380)
参考资料	(397)
后记	(414)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清朝最后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清政府从 1901 年起开始推行以新政相标榜的改革运动，随着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在日俄战争后，推行宪政改革成为时代强音，清政府亦将宪政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 1905 年至 1911 年的“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一词源自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 年 9 月 1 日）清政府颁布的上谕中“预备立宪基础”^①一语，清政府在该谕旨中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但是，清政府在该谕旨中指出中国当下不能立刻改行宪政，实行三权分立，而是“预备立宪基础”。实际上，中国应当改行宪政不仅可以追溯理论源头，作为政府行为的“预备立宪”之开端亦可以追溯到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 年 7 月 16 日）清政府颁布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后又添派绍英，吴樾炸弹案后徐世昌、绍英因故不行，由李盛铎、尚其亨代替，史称“五大臣出洋考察”。此次出洋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实地考察各国宪政制度，为清政府能否乃至如何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决策依据。因此，该举措标志着清政府开始采取具体步骤为推行宪政改革做准备，实具“预备立宪”起点的意义。

清政府遣使出洋考察是基于内外形势综合考量的结果，该举措也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舆论普遍对该举措持欢迎态度，将其视为政府开始进行宪政改革的标志，并纷纷提出建言。国外舆论亦认为此举展示了清政府改革的新气象，亦有不少国外舆论鉴于遣使之举发生于日俄战争之后，认为其目的在

^① 《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4 页。

于参与日俄和议。清政府极为重视此次考察团的准备工作，从人员选拔到资金筹措，无不超过以往的规格。考察团随带数十名随从人员，新旧教育背景者皆有，大多为时代精英，关心时政且学有专门，该群体无疑是科举废除前清政府特别倚重的新政人才一次重要的集体展示，透过该群体我们不仅能够个案了解科举废除前新政改革人才结构，对于我们认识清政府的人才政策亦有直接参考价值。考察经费由各省分任筹措，各省认筹态度积极，然而在汇解认筹经费时则不无迟钝，致使考察经费迟迟不能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清末的财政状况。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考察团在正阳门车站起程时遭到吴樾炸弹袭击，该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评论。总体而言，清政府得到舆论更多的同情，而革命派则遭到舆论的批判。暗杀事件后，考政大臣及随从人员的心理皆发生不小波动，再加上其他原因，考政大臣徐世昌、绍英不再出行，随从人员亦有不再出行者，考察团因此重组。又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舆论一再催促下，两路考察团终于分别出行。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一路考察团，主要考察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四国，采取邀请国外政治专家演讲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考察方法。由戴鸿慈、端方率领的一路考察团主要考察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五国，主要采取实地参观的方式。考察范围以各国宪政制度为主，同时对各国经济、文化、教育等广泛关注，大致做到了谕旨中“考求一切政治”的要求。以端方、戴鸿慈一路为例，考察的国别达十五国之多，银行、公司、学校、工厂、监狱等皆属于考察之列。清政府驻外使节负有接待之责，他们积极推荐留学生、联络外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留学生普遍对考察团持欢迎态度，他们或加入考察团协助考察，或上递条陈表述己见，或翻译书籍赠给使团，表现热情积极，展示出新知识阶层日益增强的参与意识。各国普遍对考察团给予热情接待，国外舆论界也极为关注考察团的考察行程。可以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团是有清一代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考察国别最广的官方考察团，是中国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此次考察展示了中国的改革形象，有效地联络了中外邦交，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考察团考察期间，国内舆论热切期望考察团考有所得，归国后能够大有作为，除了关注考察团行程外，并多有建言。由于立宪问题在立宪派和清朝统治集团部分人中间达成了某种共鸣，与清政府处于对立地位的革命派不遗余力地

揭露清廷立宪的虚伪性，五大臣出洋考察则成为革命派批判清政府假立宪的焦点事件，形成反对清政府立宪的第一个舆论高潮。考察团归国后，指陈中国应仿效日本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进行宪政改革，并提出模仿日本将官制改革作为中国宪政改革的第一个步骤。考察团这些建言为清政府所采纳，并最终下定决心实行立宪，在考察团归国不久即颁布“仿行宪政”谕旨，虽然没有明言师法日本，实际上初步确立了师法日本的改革方向。不可忽视的是，考政大臣对宪政的理解存在着实用主义的倾向，集中表现为截取宪政中有利于己的部分。尽管如此，不少我们今天仍在探求的话题，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观念、自治精神，等等，都可以在他们的言论中找到踪影。

社会改革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社会工程，社会诸要素之间呈现纷繁芜杂的相互联系、作用、矛盾、制约等关系。恩格斯曾言：“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① 五大臣出洋考察发生于纷繁芜杂、极其动荡的时代，清政府统治危机四伏、立宪呼声高涨、革命派势力与日俱增，整个社会交织着改良与革命两种变革模式的抉择与论争。考察团的派出不仅反映出立宪思潮在统治阶层内部的涌起，也反映出清政府对社会舆情的顺应以及对革命派压力的应对。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并没有下定推行宪政改革的决心，他们担心立宪政治会影响自己的统治，由此采取调查以后再行决断的审慎态度。围绕考察团从派出以至归国的整个过程，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立宪派、革命派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引发的广泛社会关注使之具有鲜明时代符号的意义，该事件无疑为我们认识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关系及演化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 1949 年前

五大臣考察团归国不久，康继祖即撰成《预备立宪意见书》，依亲身所历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7页。

及报刊资料，侧重记录五大臣考察行程及舆论反应，正如作者序言所说：“是书自五使出洋以至回国，所有一切情形无不搜讨殆尽，且又分目别类，次序秩然。”^①该书为当时人写当时事，展示了一个普通民众对此次出洋考察的看法，同时转载了不少国外舆论对考察团的评论，也为我们研究此次考察提供了宝贵史料。

1909年，日本人佐藤铁治郎指出，正是袁世凯“非行宪政不能免革命之风潮”的陈奏，推动清政府做出遣使出洋举措。作者将五大臣出洋考察与甲午之战、戊戌变政、庚子联军之役并列为影响中国“兴亡之绝大关键者”^②。

1912年到1949年，国内虽没有关于五大臣出洋的专门研究，但相关法制史、政治史论著普遍对该事件给予关注。杨幼炯将此次考察视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正是由于端方、载泽回国后的条陈，“清廷预备立宪之议遂决”^③。李剑农指出日俄战争推动了政府官员对宪政的倡导，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就是“表示要立宪的意思”，而吴樾的炸弹“是国民不承认满清伪立宪的表证”^④。吴经熊指出清政府鉴于“当时的人都相信‘立宪’是强国的不二法门”，派遣五大臣出洋是慈禧与王公大臣商定的“粉饰立宪之策”^⑤。

二 1949年至1980年代初

据笔者所见，孙任以都于1952年发表的《1905—1906年的中国宪政考察团》是最早较为全面论析五大臣出洋的整体研究。文章结论指出：“1905至1906年的考察团为处于窘境的清政府提供了临时解药，但是因此说它开启了北京政府转变为一个宪政帝国的钥匙，对比欧洲国家，这种观点则显得片面。……西方政治话语里的议会、责任内阁及其他名词，在汉族及满族的改革者眼里，全部被视作巩固统治的工具，并且一定要与传统的价值观和体制相适应，这就是他们理解中的宪政。政治改革需要具备像接受西方科技那样的求真精神，但同时又要尽力避免与旧秩序的冲突，国外宪政专家提出的良方被他们

① 康继祖：《预备立宪意见书》“序言”，1906年刊本。

② [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3—4页。

③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影印，第33页。

④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影印，第234、252页。

⑤ 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11页。

的传播者错误地理解了。宪政考察团表达的不仅仅是满族政权改革的努力，更展示了这个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①

诺柏尔特·麦恩北从宪政理论的角度指出考察团所提供的各类报告并非对各种立宪制度作一详细的分析，这即便对西方研究立宪政治的学者来说也是一项艰巨的、无止境的任务，当时他们提供的只是一套供清廷选择的建议。该文同时认为：“严格说来，研究报告并非大臣亲自拟的，而是由若干特别挑选的下属拟的。尽管如此，它仍应视为戴、端二人之作。他们把报告上奏给皇上；对所陈事实和意见是承担责任的。”^②

沈云龙认为五大臣的派出是奕劻、瞿鸿禨暗斗的结果，奕不满于瞿，请徐世昌商之于袁世凯，拟借准备立宪为名，请派瞿出洋考察政治，实欲挤之出军机，瞿时兼外务部尚书，自不容推卸。袁世凯亦以为然，遂由徐世昌于军机处提出此议，瞿知奕劻排己而以年老辞，徐“为折中调和计，遂自请成行”^③。赵秉忠认为考政大臣嗅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新鲜空气，但这决不会改变他们的阶级立场，即便个别人有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认识，但在当时只能是幻想，“他们实际上不过充当了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中的工具”^④。

这一时期，国内以“革命史”角度立论的著作，指陈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虚伪性，吴樾由于谋炸五大臣成了他们笔下的主角。章开沅认为吴樾炸弹案“是人民对清王朝假饰立宪骗局所发出的抗议”。其评价考察团：“载泽们希望立宪所能招来的大利，实际上只有‘皇位永固’，‘内乱可弭’两大端，说穿了，就是要假饰立宪，以达到抵制革命，巩固其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⑤李新认为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只不过是做一个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总的内外形势所决定，清政府既已迈出了这一步，它也很难半途停止或翻然改辙”^⑥。金冲及将吴樾炸弹案视为革命派与立宪派矛盾、冲突激化的标志，“表明革命派和立

① E-Tu Zen Su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issions of 1905 - 1906",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24, No. 3 (Sep., 1952).

② 诺柏尔特·麦恩北：《清政府对立宪的准备：清政府对宪政的理解》，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处论文组编：《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357页。

③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3页。

④ 赵秉忠：《清末五大臣出洋》，《历史教学》1983年第6期。

⑤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386页。

⑥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2页。

宪派的矛盾冲突已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预示着革命和立宪之间的一场大论战是不可避免的了”^①。唐宝林梳理了吴樾谋炸五大臣的策划经过，认为此次谋炸并不是吴樾的个人行动，而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革命行动，直接参与策划的有陈独秀、杨毓麟和赵声等人。^②

由于孙任以都文章的发表，这一时期是为该项研究的奠基阶段。但是，受政治风气影响，国内研究者将行刺五大臣的吴樾作为描述重点，而对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始末则一笔带过，且评论大多欠客观公正。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

随着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以及《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资料的整理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深入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考察团的派出。朱金元从宏观着眼，认为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原因有三：开明官僚的直接敦促；国内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和立宪派的积极呼吁；帝国主义推行其侵华新政策的需要。^③ 这些论点大多为以后的研究所延续，但是最后一点逐渐淡化。^④ 侯宜杰则着力探讨了江浙立宪派与清政府遣使决策的关系。作者认为，江浙立宪派充当了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的主角。鉴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江浙立宪派提出遣使主张，以声明我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地位。随着国内立宪呼声日益高涨，江浙立宪派的遣使目的发生了转变，逐渐演化为学习国外的立宪政体。他们极力联络清廷官员，最终使得清廷相当部分的官员提出遣使主张，促成了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决议。^⑤ 沙培德强调了宪政专家梁启超对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推动之功：“梁启超数量众多的著作不仅仅代表着其本人独一无二的地位，更代表了初露端倪的

①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8 页。

② 唐宝林：《吴樾炸五大臣策划经过》，《安徽史学》1984 年第 3 期。

③ 朱金元：《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学术月刊》1987 年第 5 期。

④ 如赵玉莲《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与清统治者对西方认识的深化》，《外交评论》1991 年第 4 期；赵广示：《试析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政治考察的原因》，《贵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⑤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54 页。

精英意识。……1900至1905年间，梁启超致力于建设中国为宪政帝国的努力，1905至1906年，清政府基本上接受了他的主张。”^①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撰成《立宪法议》一文，提出立宪实施次第的设想，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政府派遣大臣三人带领随员出国考察。后来，梁启超又代考察团起草奏折、考察报告，其与考察团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第二，考察途次及考察成果。川岛真探讨了五大臣及稍后的三大臣对国外宪政的考察。尤其利用《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考察了驻英使臣汪大燮对考政大臣的评价及合作。^②孙安石对五大臣在国外的考察过程和归国后的建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注意展示时人对该事件的反应。^③另外，孙安石还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对考察团在日本的考察活动及日本朝野的反应进行了探讨。^④福田忠之亦据由孙安石首先发掘利用的日本外交档案，考察了载泽一行在日本的考察活动。他指出，由于考察团是在日俄谈判的背景下派出的，日本起初对其抱有某种疑虑。作者认为，考察团通过考察各国，对外国宪政有了直接的了解，其归国后的建言成为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上谕的“直接契机”^⑤。

赵广式通过分析载泽、戴鸿慈的两部日记，认为此次考察促使五大臣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转变，他们的著述、译著为研究当时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中国百姓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且加深了中国人民同欧美、日本等国人民间的了解、交往、联系和友谊。^⑥贺嘉分析了五大臣归国后的建言，其得出了效法德、日的结论，对清末制宪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拉开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近代化的序幕”^⑦。

① Peter Zarrow,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Late Q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tate”,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生活、知识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11月21—23日。

② 川岛真:《光绪新政下の出使大臣と立宪运动》,《东洋学报》1994年第75卷。

③ 孙安石:《清末的政治考察5大臣の派遣と立憲運動》,《中国—社会と文化》1994年第9号。

④ 孙安石:《光绪新政期、政治考察5大臣の日本訪問》,《歴史学研究》1996年第685号。

⑤ 福田忠之:《清末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与明治日本》,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编委会编:《日本思想文化研究》2007年第9期,(日本)国际文化工房2007年版,第14—23页。

⑥ 赵广式:《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积极成果》,《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⑦ 贺嘉:《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先声:论五大臣出洋考察及其结论》,《汉中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关于端方、戴鸿慈一路考察团找人撰写考察报告之事，学界普遍认为系由熊希龄负责，而求助于杨度、梁启超，但大多语焉不详。^① 杨中立在博士论文《梁启超与清末立宪运动》中，有“梁启超与考察宪政”专节，然并未对梁启超与考察团的交往进行考证，而是在梳理、归纳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倾向于认为熊希龄并非委托杨度，而是直接与梁启超联络，并指出“这个争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梁启超确曾代考察大臣草拟了报告”^②。迟云飞在《戊戌以后康梁与清廷官员的联络活动》一文中，指出清政府的遣使主张对梁启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因此，参与和督促清廷实行立宪，便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与清廷官员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文章指出，端方给熊希龄下达了两项任务，一是主持编纂介绍外国政治制度的书籍，一是起草条陈和奏折。并且，熊希龄直接与梁启超接洽，并非求助于杨度。^③ 周秋光依据熊希龄档案史料，指出熊希龄仅仅到了德国，戴鸿慈、端方便命他返国经理编辑事宜。熊希龄归国后，找人组成编辑队伍，由张鹤龄“总其成”，随后赶赴日本，一方面找杨度要稿子，另一方面在日本购买一些欧美国家的书籍，请留学生帮忙翻译以作补救。等到戴、端回国，“枪手”的文章及在日本的译件均已带来了，再经过加工整理，“枪手”的文章便成为立宪的各类奏折，译书定名为《欧美政治要义》。^④

关于载泽考察团的考察成果。张玉法根据《政治官报》列举了载泽考察团编写的三十部提要及编译的一些书籍，但没有展开论述。^⑤ 前引福田忠之文亦是如此。无疑，三十部提要及编译书籍是了解载泽考察团宪政思想的重要文本。

① 代表性论著有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第135页；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董方奎：《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第169页；李守孔：《论清季之立宪运动——兼论梁启超、张謇之立宪主张》，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编），第33页；周秋光：《熊希龄与清末立宪》，《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狭间直树：《清朝的立宪准备与梁启超的代作上奏》，载徐洪兴等主编《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211页。梁启超研究通论著作，对梁启超代笔事亦有所提及，如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② 杨中立：《梁启超与清末立宪运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168—177页。

③ 迟云飞：《戊戌以后康梁与清廷官员的联络活动》，《北大史学》（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05页。

④ 周秋光：《熊希龄与清末立宪》，《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⑤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8）1971年版，第313—314页。

另外，一些以五大臣出洋考察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大多依据两部考察日记，探讨考察团在国外的考察情况，唯资料开发有限，研究深度不无欠缺。^①

第三，考政大臣。关于考政大臣的研究集中于端方、戴鸿慈两人。

刘高葆指出端方宪政思想来源于三个方面：参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立宪派关系密切以及出洋考察的经历。作者指出“端方是旧官僚具有新思想，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他主张的改革是传统范围内的改革，政治倾向总的来说是保守的，他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不属同一水准。同时又认为端方是一个改革派人物，他主张君主立宪，本身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客观上削弱了政府的集权专制。^②迟云飞指出端方出洋考察归国后更加热心于倡导立宪，他设计的方案中，君主的权力不再是无限的了，君主的行动不仅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而且还有责任内阁的牵制，议会的抗衡，作者认为端方的宪政思想“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理论基础”^③。张海林所著《端方与清末新政》是首部端方研究的专著，该书描述了端方、戴鸿慈一路在国外的考察情况。作者认为出洋考察对端方一行“产生思想冲击力”的事项包括八个方面：政治制度、自由与平等精神、司法制度、狱政、工业、教育、社会公共事业以及民风民俗。作者指出《欧美政治要义》及《列国政要》虽由端、戴两人署名，但两书实际上是端方编定的，通过对这两部书的分析，作者给予端方极高的评价：“端方不愧是晚清政坛上思想前卫的少壮派政治家，他的眼界胆识在当时无人出其右。……晚清时期的历史事实是，力主和平渐进而思想开放的官员和绅士恰恰是传播西方自由权利理念的主力。端方是他们的佼佼者。”^④

俞勇娉《戴鸿慈与清末宪政运动的开端》以戴鸿慈立论，实际上考察了戴、端考察团的宪政主张，文章指出考政大臣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清政府预备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没有超出戴鸿慈等设计的方案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戴鸿慈等人“不仅是清末宪政运动开启的推动者，而且更是这

① 宫凯：《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成果缕析》，河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树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述评》，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刘高葆：《试论端方的立宪渊源及其对宪政的理解》，《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5年第1期。

③ 迟云飞：《端方与清末宪政》，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9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85页。

④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59页。